

論「結合」的
實踐性和科學性

张居华



128568

论“两结合”的实践性 和科学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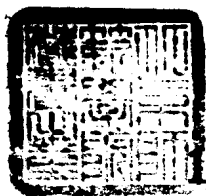
张 居 华

文化艺术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97782



1097782

论“两结合”的实践性和科学性

张 居 华

*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940毫米1/32 印张2.75 字数46,000

1984年10月北京第一版 1984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4,800册

书号10228·105 定价0.30元

目 录

一	引言	1
二	“两结合”提出的实践基础	3
	(一) 人类文艺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的汇合	4
	(二)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革命现实主义 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	6
三	“两结合”提出的科学根据	15
	(一)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文艺领域里的反映	15
	(二) 人类文艺理论批评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汇合的理论	20
	(三) 社会主义文艺的产生和发展促使对“两结合” 的科学探索	29
四	“两结合”的基本特征	39
	(一) 认识现实的基本特点	38
	(二) 反映现实的基本特征	49
	(三) 影响现实的审美特性	63
五	“两结合”与艺术规律	71
六	“两结合”是不可抗拒的艺术潮流	79

— 引 言

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以下简称“两结合”），许多人都说这是一个比较难谈清楚的问题。我开始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同意这种说法，但是后来却认为，这是一个不能不谈清楚的问题；而且通过加强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础上的共同探讨，也是可以谈清楚的问题。因为创作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需要它，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近期，文艺界和学术界对“两结合”创作方法，产生了各种分歧意见。这些不同的见解，虽说是众说纷纭，然而我认为，分歧集中表现在：“两结合”合不合科学性？有没有实践基础？正由于有的同志对“两结合”的科学性、实践性提出了质疑，所以文艺界和学术界的有些同志，包括某些领导同志，不敢理直气壮地宣传和提倡它。更有甚者，有的同志干脆说，“两结合”本身就不是“一个科学概念”，认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包括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根本不可能结合，因此，“两结合”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创作方法。这样一来，“两结合”创作方法一度遭受到不应有的冷遇、诋毁和否

定。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有个别同志提倡所谓“社会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以此取代“两结合”和其他社会主义文艺的创作方法，把文学史上资产阶级的旧现实主义，戴上“社会主义”的桂冠，冒充社会主义文艺的创作方法，这实在是一种糊涂观念。

当然，以往曾经有过对“两结合”创作方法褒之过分的地方，比如，称它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最好的创作方法，把它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立起来，用它去否定单独存在的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近来，又出现对“两结合”创作方法贬之不当的地方，比如，说它是“大跃进”跃出来的“土产”，不仅没有给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提供成功的经验，反而有使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受到损害的沉痛教训，直至否定“两结合”的存在。这种抓住以往褒之过分的地方，而贬低和彻底否定“两结合”的作法，其实与褒之过分一样，都是违背它的实践性和科学性的。不管是褒之过分的张皇之辞，还是贬之不当的诋毁之语，都不能归咎于“两结合”本身的过错，而只能说明是人们认识上的失误。正如别林斯基所说：“对真理的虚伪而错误的理解，并不能损毁真理本身。”（《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第429页）今天，我们有责任让“两结合”在坚实的实践基础上，恢复它的科学面貌。

二 “两结合”提出的实践基础

“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出，同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指积极浪漫主义，下同）以及较早提出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样，都是对早已存在于文艺实践中的创作方法的理论概括，并非某个人头脑发热时想出来的。

实践证明，中外文艺史上，有许多优秀的古典作品，很明显地体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不同程度的汇合。为什么这里称“汇合”而不称“结合”呢？因为过去时代的旧现实，同广大劳动人民的理想常常得不到统一，所以古典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也就不可能达到有机的结合，而只能是某种程度上的汇合。“两结合”就是对文艺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汇合进行革命改造的结果。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不自觉的汇合，发展到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自觉的结合，是一个质的飞跃，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汇合，同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区别开来，是必要的。

我认为，中外文艺史上，大量存在的现实主义

和浪漫主义相汇合的优秀作品；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史上出现的许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或者说，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优秀作品，都可以说是“两结合”创作方法提出的实践基础。

(一) 人类文艺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汇合

不难理解，人类文艺史上，创作方法与文艺创作是同时产生的。在人类童年时代，人们只晓得从事文艺创作，并未自觉地、明确地认识到自己正在采用着什么创作方法。从理论上总结出创作方法，大抵是在开展文学创作很久以后的事。恩格斯曾经指出：

“人们远在知道什么是辩证法以前，就已经辩证地思考了，正象人们远在散文这一名词出现以前，就已经用散文讲话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55页）同样道理，中外的古典作家们，远在知道什么是现实主义，什么是浪漫主义，什么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汇合以前，就已经按照这样的创作原则和方法进行创作了。

只要我们认真考察一下人类文艺发展的状况，就会发现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贯穿人类文艺史上的两大最基本的潮流；它们时而分支，时而汇合，既各显其能，又互相促进。

它们并非象有的人所说的那样，总是互相对立、互相排斥、背道而驰的。

在我国文艺发展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汇合的事实，是大量存在的，也是由来已久的。就是说，从远古起，历代都有许多杰出的文艺作品，具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汇合的突出特色。

周扬同志曾经这样说：

历史上许多伟大的杰出的作家、艺术家，虽然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他们的个性和风格各异，有的更富于现实主义精神，有的更富于浪漫主义精神，有的以精雕细琢的写实手法见长，有的以奔放的热情和大胆的幻想取胜，但他们总是常常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精神、两种艺术方法的不同程度的结合。他们在揭示现实的种种不合理现象的时候，总是把他们的社会理想、强烈的爱憎和明确的褒贬体现在作品中所描写的人物的性格和关系上；同时他们的昂扬热情和崇高理想又总是由于现实的不合理的现象所激发，植根于生活的土壤的。①

这段话，不仅符合我国文艺发展史的实际，而且也符合整个人类文艺发展史的实际。因为中外文艺史上，都有许多杰出的作品，既不纯粹是现实主义的，也不纯粹是浪漫主义的，而是两方面的不同程度的汇合。所谓“汇合”，并不要求一半对一半，

① 引自《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

那么平均划一，而是可以有主次，也可以大体上相当。

我国第一部杰出的诗歌总集《诗经》，其中的优秀作品《硕鼠》、《相鼠》、《蒹葭》等，就明显地具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汇合的特色。它们既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现实，诗中又闪耀着浪漫主义的光辉。就以《硕鼠》来说，它深刻反映了劳动人民对大鼠似的统治者的愤怒和咒骂，同时也表现了“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的美好理想。虽说诗中寻找的“乐土”、“乐园”、“乐郊”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理想，然而却强烈表现了誓与剥削者决裂的反抗精神，以及追求没有压迫、没有剥削、自劳自食的理想社会，无疑对读者具有较大的鼓舞作用。虽然诗中表现的是一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朦胧状态的汇合，但毕竟是它们汇合的萌芽。

在我国文艺发展史上，不仅有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有浪漫主义的光辉传统，而且也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汇合的美好传统。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代表作《离骚》，它的基调虽然是浪漫主义的，然而汇合着现实主义成分，因此，可以说是“两汇合”的艺术珍品。诗中极其强烈地表现了上天入地、追求那种“足与为美政”的社会理想，并使这种理想建立在“临睨夫旧乡”的现实基础上。乐府民歌《孔雀

东南飞》中的“鸳鸯向鸣”，戏曲《窦娥冤》中的“六月飞雪”，《白蛇传》中的“水漫金山”，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蝴蝶双飞”，都是在不合理的、黑暗的现实基础上，强烈地讴歌叛逆精神和对美好理想的热烈追求。这些优美的作品中，以现实主义为基调，其中包含着浪漫主义因素，具有明显的“两汇合”的特色。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再比如，杜甫的《洗兵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战城南》；白居易的《新制布裘》，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等等，都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汇合的优秀作品。明清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它们都是以现实主义为基调，同时汇合着浪漫主义的因素。就拿《水浒传》来说，在深刻揭示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的现实基础上，表现了农民的“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社会理想。虽说这种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人人平等的社会理想，是一种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然而作为当时现实基础上产生的美好理想，对以后封建时代的农民起义，起过很大的鼓舞作用。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汇合，不仅在我国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一样，自古有之，源远流长，而且这种“汇合”，在外国也是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一样，自古有之，源远流长。

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新译《伊利昂

记》)和《奥德赛》(新译《奥德修记》),是欧洲文学史上最早的杰出作品。它们一方面真实描写了公元前十二世纪末,发生在希腊半岛南部地区的阿开亚人和小亚细亚北部的特洛亚人之间的十年战争,广泛地反映了古希腊早期奴隶社会的现实生活,成为后人研究希腊早期社会的重要文献;另一方面,把战争中两军中英雄人物的传说同神话故事交汇在一起,创造出象阿喀琉斯、赫克托耳、俄底修斯等理想的骁勇善战的英雄人物,至今“仍然能给我们以艺术享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4页)。因此,史诗中既富于现实主义精神,又富于浪漫主义色彩,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在人类处于童年时代的早期汇合的艺术珍品。

此外,还有象意大利但丁的《神曲》、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德国歌德的《浮士德》、法国雨果的《悲惨世界》、俄国果戈理的《钦差大臣》、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等等,都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汇合的不朽之作。就以《浮士德》来说,它既是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初期德国现实生活的概括,又充满浪漫主义的想象、夸张和神话故事的色彩。表现了对美好理想的热烈追求和讴歌。它的主人翁浮士德,是一个对理想的积极探求者,他在揭露封建社会黑暗现实的基础上,提出为“自由的国民”去“开拓出疆土”的理想。这种自由、幸福

的“疆土”即乐土，虽然只不过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社会理想，其实质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然而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某些愿望，能够起到鼓舞人们去改变封建社会现实的进步作用。《浮士德》这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汇合的伟大史诗，是革命导师马克思和列宁极力推崇的杰出作品。

由此可见，“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出，是对人类文艺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汇合的传统的革新和发展。我们决不可以割断历史，应该看到从“两汇合”发展到“两结合”的历史连续性。这说明，“两汇合”是提出“两结合”的历史根据，也就是说，“两结合”是人类文艺发展的实践经验的总结。

（二）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

“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出，不仅有人类文艺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汇合的历史经验，作为它的实践基础，而且有中外无产阶级文艺创作的新鲜经验，作为它的更直接的实践基础。

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它同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结合，这不仅决定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艺的产生和发展，也决定了新的创作方法的必然产生和逐步完善。这时，也只有这时，从人类文艺史上的现

实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汇合，继承、革新而来的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者“两结合”，应运而生。

必须指出，早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者“两结合”，还没有作为一种独立的创作方法明确提出来以前，中外就已有许多无产阶级的诗人、作家、艺术家在创作实践中，开始不同程度地运用了它们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并且创作出了一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优秀作品。

早在一百多年前问世的巴黎公社诗歌，其中有些作品，特别是举世闻名的欧仁·鲍狄埃的《国际歌》，就明显体现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最初结合。因此，可以说，它们是“两结合”的第一批作品。

高尔基继承了巴黎公社诗歌的“两结合”传统，他的长篇小说《母亲》的问世，使“两结合”创作方法得到完善。《母亲》这部驰名世界的作品，是在俄国一九〇五年大革命遭到失败，革命暂时处于低潮的历史条件下问世的。高尔基并没有被这种革命暂时遭到的挫折蒙住了眼睛，而是既看到了现实斗争的艰巨性，又看到了通过不断斗争终将取得革命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美好理想的必然性。因此，在《母亲》中，第一次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的光辉形象。象巴威尔这样的为社会主义理想而奋斗、献生的革

革命工人的优秀代表，象尼洛夫娜这样的工人的革命母亲，在当时还是极为稀少的。如果高尔基不能从稀少的新生事物中，预见到革命现实发展的趋势和前途，缺乏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那他无论如何也写不出象《母亲》这样的“两结合”的奠基之作。

继《母亲》之后，从苏联二十年代起，陆续出现了一大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者说“两结合”的优秀作品，比如，长篇小说《铁流》、《毁灭》、《恰巴耶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长诗《列宁》、《好！》等等。这标志着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不同程度的结合，在苏联文艺创作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倾向，或者说一种思潮，也标志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者“两结合”的文艺创作，在苏联已经走上成熟的道路。

在国际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影响下，我国也早已出现“两结合”的作品。比如，郭沫若的《女神》中的一些火山爆发似的诗篇，就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两结合”作品的雏型，距今天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它们反映了诗人早期对黑暗现实的猛烈抨击的革命精神，同时，也表现诗人对于美好理想的狂热追求。毛泽东同志的诗词中，有许多瑰丽的诗篇是“两结合”的艺术明珠。其中《沁园春·长沙》是第一首，写于一九二五年。诗人面对黑暗的现实，以天下为己任，

藐视一切权贵，勇于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驾驶着革命的“飞舟”，迎着逆流恶浪，驰入理想的新世界。这说明，毛泽东同志是从创作“两结合”作品为起点，步入诗坛的。他坚持走“两结合”的创作道路，写出许多脍炙人口的雄伟而优美的诗篇，比如《念奴娇·昆仑》、《沁园春·雪》、《蝶恋花·答李淑一》、《七律·到韶山》等等，都是“两结合”的光辉诗篇。

在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毛泽东同志诗词创作的巨大影响下，在不长的时间里，我国就创作出大批优秀的、或者比较好的“两结合”的作品。郭沫若、周扬合编的《红旗歌谣》中，虽然某些诗歌受到当时左倾思想的影响，沾染了“浮夸风”的灰尘，然而其中有许多应该说是好的、比较好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品，或者革命浪漫主义作品，或者“两结合”的作品。比如《我是一个装卸工》，就是一首比较好的“两结合”作品。诗的开头两段是这样的：

我是一个装卸工，
威镇长江万里程，
左手搬来上海市，
右手送走重庆城。

我是一个装卸工，
干劲冲破九重天。

太阳装了千千万，

月亮卸了万万千。

显而易见，诗的现实基础是码头上装卸工人的生活，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上，抒发了工人阶级的英雄气概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是一首气势磅礴的“两结合”的雄壮诗篇。

此外，还有象长篇小说《红旗谱》、《林海雪原》、《红岩》、《创业史》，歌剧《洪湖赤卫队》，话剧《于无声处》、《丹心谱》、《未来在召唤》，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电影《李双双》，诗歌《天安门诗抄》中的一部分，以及郭小川、贺敬之的一些诗，等等，都是优秀的或者比较好的“两结合”作品。就拿《红岩》来说，它反映的是旧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监狱里的斗争生活。据两位作者说：“《红岩》的初稿写得很不好，既未掌握长篇小说的规律和技巧，基调又低沉压抑，满纸血腥，缺乏革命的时代精神，未能表现先烈们的壮烈的斗争。”（《创作的过程、学习的过程》，《中国青年报》1963年5月13日）他们总结了教训，认真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特别是学习按照“两结合”的原则和方法，去认识生活、反映生活和影响生活。这样一来，他们从整体形势的全局出发，站得高，看得远，用共产主义理想照亮先烈们的监狱斗争，塑造出象许云峰和江姐这样具有革命英雄主